

## 《萧山任氏家乘》中的刘基文献考述

蔡堂根

刘基自元惠宗至正八年(1348)任江浙行省儒学副提举,寓居杭州<sup>①</sup>,到至正十六年(1356)复任江浙行省都事回处州,在这8年左右的时间里,或任职,或赋闲,大部分时间都生活于杭州、绍兴一带,故常往来萧山。当时的萧山县主簿赵某、县民包与善、贾性之等都与刘基有交往,如刘基曾为主簿赵某作《北岭将军庙碑》,为包与善撰《棣萼轩记》,为贾性之撰《贾性之市隐斋记》等,其中,任氏家族的任原礼与刘基的交往尤其密切。

萧山任氏素称大族,世居萧山昭明乡(今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城厢镇),该乡紧靠萧山县城,与浙东运河为邻,是吴越之间的交通要道,也自然是舟楫商旅、文人墨客的必经之路。元朝末年,任氏家族中的任荣、任伯大、任原礼等祖孙三代不仅乐善好施,且热情好客,“名公巨士东西行过,无不礼焉,馆谷必丰,赆遗必厚”<sup>②</sup>,以至高明、刘基、王祎乃至途经萧山的吏部尚书刘谦等都曾成为任氏家中的座上客。

据王祎的《萧然山堂记》记载,至正前期,任伯大(任原礼之父)、任叔大兄弟曾在萧山县城北侧的北干山南麓为其父母任荣等修建百年之后的墓室,并“构室其旁,因俾诸子读书其间”<sup>③</sup>。这座任氏子弟读书的场所最初名“怡怡山堂”,名字就是刘基取的,刘基因此撰有《怡怡山堂记》,记中有“伯大之子

①关于刘基任江浙行省儒学副提举的时间存在争议,本处采周松芳《自负一代文宗——刘基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的观点,详见该书第220页。

②苏伯衡:《元处士任子仁公墓志铭》,《萧山任氏家乘》卷十三。现存的《萧山任氏家乘》有多种版本,本文所引,均出自任以任等所修《萧山任氏家乘》,嘉庆十一年永思堂刻本。

③王祎:《萧然山堂记》,《萧山任氏家乘》卷十四。王祎《王忠文集》卷十也有收录,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原礼与予善，邀予游而请名其堂”<sup>①</sup>之语。该堂后来可能又由刘基改为“萧然山堂”，故王祹的《萧然山堂记》中有“括苍刘先生名曰萧然山堂”之语。“萧然山堂”也因此成了高明、刘基等名流宴游聚会之所。可见，刘基与任氏的交往非常密切，也因此，刘基为任氏留下了众多的诗文。

刘基等人留给任氏的诗文多收录于《萧山任氏家乘》（以下简称《任氏家乘》）中。《任氏家乘》创自明代洪武初年，正德三年，族人任鉴又在旧谱的基础上，“重录而备辑之”，“先叙其世系图，次序其群贤文翰，后叙其家学遗芳”，“先人名行之下，则传其行实，记其谥号，填其墓所，而后之子姓一一而收录之”<sup>②</sup>，任氏家谱因此更加完善。清顺治、康熙年间，族人任云蛟、任荣龄等以正德本旧谱为基础，先后重修家谱，嘉庆十一年，族人任以任等再次重修家谱<sup>③</sup>。可见，《任氏家乘》流传有序，源流清晰，是一部有较高文献价值的家谱。

## 二

《任氏家乘》中收录有数十篇署名高明、刘基、王祹、苏伯衡、顾硕等元末明初人物的诗文，这些诗文除少数为相关的文集所收录外，大部分暂未见到其他文献载录。

署名“刘基”的诗文共7篇（首），即《怡怡山堂记》、《任君燕居记》、《题萧然山堂记后》、《长江风雨图送任原礼归萧山》、《送任原礼东归》、《送养晦先生东归》、《任氏世系图叙》。其中，《怡怡山堂记》为林家骊整理的《刘基集》所收录，文字略有出入；《题萧然山堂记后》也为《刘基集》所收录，文字完全一致，但题为《萧山任氏山堂》；其他5篇，暂未见到其他文献收录。

此外，与刘基密切相关的还有：高明的《陪青田诸公宴萧然山堂》，王祹的《萧然山堂记》，苏伯衡的《跋刘伯温先生手帖后》、《送任原礼东归序》、《跋王子充先生撰〈任氏萧然山堂记〉后》，顾硕的《跋任氏交游文翰卷后》等。这些诗文除《萧然山堂记》为《王忠文集》所收录外，另外5篇均未见其他文献载录。

①刘基：《怡怡山堂记》，《萧山任氏家乘》卷十四。林家骊点校的《刘基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中也有收录。刘基的集子有多种流行的版本，为方便起见，除特别说明者，本文所引述的刘基诗文均以林家骊点校的《刘基集》为依据。

②任鉴：《重修家谱序》，《萧山任氏家乘》卷一。

③同治年间，任氏又编《萧山任氏家乘》二十卷，本文以嘉庆本为研究对象，故此以后所修家谱不再梳理。嘉庆本《萧山任氏家乘》共16卷，每卷一册。首卷除目录、世系图外，还收录了历次修谱的谱序，如上文提及的刘基、魏驥、何舜宾等人的图谱序等。中间的十馀卷载任氏各支派的世系流传情况。最后四卷主要收录历代的序记、诗歌等，分为《赠言》和《遗芳集》两大部分，其中，《赠言》主要收录序记等各种散文，《遗芳集》主要收录诗歌等韵文。

为便于相关研究者了解，今将 10 篇未为其他文献所收录的诗文全文抄录如下：

任君燕居记 刘基

至正之秋，八月既望，余时馆于萧山任隐君伯大家。厥子原礼与余善，尝赠《怡怡堂记》矣，尝赋萧然任氏篇什矣，翰墨载诸彤管，固不一而足。至是，复以燕居请予，予不辞而记之。曰：居曷取乎燕耶？君奚为而乐于燕居耶？盖居于朝廷，则政事所出，侃侃尔，与与尔，缩缩尔，君在侧（原文为“则”，据下文改）礼然，而身不得以自由也。居于乡党，则宗族所聚，恂恂尔，似不能言尔，亲在侧礼然，而意不得以自适也。居于宗庙，则礼法所羁，便便尔，每问尔，唯谨尔，尊在侧礼然，而情不得以自舒也。三者皆非所居之位。意唯燕居，则墉焉紫紫，垣焉重重，堂焉冲冲，台焉崇崇，室焉溶溶。所而序，级而荣，觞于斯，咏于斯，寅宾戚于斯。朝钟暮鼓之音，四时山水之色，索笑于群芳，借听于万籁者，恒于斯，尽可供余乐于有终。噫，此特燕于其外者耳，而未究其本也，非任君意也。其意亦唯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兄弟既翕，和乐且耽；父母其顺矣，怡怡融融。洞我神牖，塞我六窍；时不眩志，遇不易操。锡马三接不为亨，雉膏不食不为困；群小交憎不为愠，而四海宗之不为耀。观寥廓以燕其量，熙日月以燕其明，配易简以燕其德，瞻斗极以燕其灵，法刚柔以燕其用，随寒暑昼夜之感应以燕其精，则上下四方之宇，往古来今之宙，浩浩乎悉囿于燕居之中，而大化在我矣。《论语》云：“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而孔子亦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夫疏饮曲肱，非居之燕乎！申申而容舒，夭夭而色愉，非燕居之乐乎！孔子其太和流行，与天地同泰者乎！噫，任君以燕名居，其得夫子之燕居乎！乐不既深乎！予爰嘉而记之。括苍刘基伯温撰。（卷十四）

长江风雨图送任原礼归萧山 刘基

风雨号，雷电骄，长江汹涌泛洪涛。沙飞石走草木折，鼉鼉远遁蛟龙逃。雨师飞控，倒泄天瓢。冯夷踏浪，骑伏伊操。华岳为之播撼，三山为之动摇。其险也如此，焉能容吾舳。远客胡为而来往，无羽翰，心烦劳。尔何不拔长剑，凌云霄，荡涤宇宙无纤毫，仰观白日青天高？（卷十六）

送任元礼东归 刘基

乱离不见任公子，今日重逢十载馀。共对青灯烹玉兔，独惭白发佩金鱼。杨雄虽老犹能赋，贾谊何言不上书。归去萧山寻旧隐，绕篱黄菊早霜初。（卷十六）

送养晦先生东归 刘基

子之忽相见，旧交慰远念。来从古越州，语罢思悠悠。相见即言归，翻

成悲继喜。念我发如丝，会合能几许。大道炳日月，进修当及时。寂寂守陋巷，杨雄非我师。性僻爱山水，送归吟越吟。鉴湖遗老请，何日遂吾心。（卷十六）

### 任氏世系图叙 刘基

元至正辛卯秋七月，西蜀赵天泽偕予过会稽，历览名山古迹。归经萧邑，为访眉山苏伯衡，于隐君任子仁先生家款留。去虎山阳怡怡山堂，盖隐君别业也。在座有浦江宋公、永嘉高公、金华王公、丽水叶公、太平李公、乐平许公，皆当时硕彦。盘桓数日，赵公先别归四川，予遂居停交辉楼。承隐君解衣推食七载，绝无怠色。后值盗贼蜂起，群雄窃据，海内分崩，民不安处，予与诸公后先辞归。己亥，胡将军下括苍，谬膺荐剡。今上招参帷幄，预赞军机。既而平定江南，由姑苏归抵武林，与隐君止隔一江，欲到旧游地再觴风月，已不可得。至今尚留余憾。洪武甲寅，予病告解组，逍遥泉石，承隐君之孙伯大、叔大之子，曰道曰瑄，惠顾敝庐，不胜雀跃。昆仲丰姿俊雅，谈论风生，乃隐君积德垒仁所致，将来远大，未可限量也。及询近祉，出所编世系图示予，乞予序。予览而知其始祖讳钥，籍贯河南，登北宋建炎中进士，除左司，言忤权贵落职。后起知山阴县事，卒于署，葬于桑盆里，子孙家焉。至五世，全心公奉父宋承直郎绪衡公枢葬北干山麓，子孙徙家昭明里；弟渊翁守高曾祖墓，仍居桑盆。六世，应珍公仗义疏财，赈穷周乏，寒者给衣，饥者给食，不克葬者捐赙以瘞，不能娶者捐资以助，病者药之，负贷者取券焚之，道拾遗金则招而还之。一邑无分男妇老稚，皆称长者。生五子，皆彬彬文雅，隐居乐道，不求闻达。八世子仁公，能修祖德，博施济众，四方名士至者，馆谷而厚赠遗，人名其族曰世长者。子伯大、叔大，继志述事，不愧前人。兄弟子侄何止数千指？十世若源、若道、若瑄、若唯一辈，虑族众日蕃，支派日远，一本视为路人，同宗尽如异姓。故矢志纂辑，循源别派，编世系图一卷。聚涣散，见真膺；大宗小宗有别，嫡子庶子有分；尊卑有序，远近可稽；开卷瞭然，无烦探索。诚孝子仁人之用心，功岂浅鲜哉？予钦其敬宗睦族，敢不赞成其美而拂其请，以没其善？然又有不得不书者：思当日班荆倾盖，义不能辞；至今春树暮云，情不能辞。故抱病率叙其始末，以楮颖代淮阴之金，作延陵之剑云尔。洪武甲寅元夕，御史中丞兼太子赞善、诚意伯青田刘基顿首撰（卷一）

### 陪青田诸公宴萧然山堂 高明

北干山前舣船处，一篙新水涨溪云。雪晴原野无多日，春入园林已一分。战蚁争蜗休入梦，晓猿夜鹤免移文。清歌且乐芳年景，回首关河日未曛。（卷十六）



### 跋刘伯温先生手帖后 苏伯衡

右二帖皆刘伯温先生手书也。至正癸巳，江浙行省左丞铁里帖木尔统诸军捕寇海上，先生以江浙儒学副提举应其辟，为其行军参谋。既而，左丞丧师被遣，先生亦自投劾而去，奉太夫人侨于越，偏舟往来鉴湖、湘湖之间。而先生之于元（原）礼也，自为提学时交游矣，至是加亲密焉。前一帖莫详遣之岁月。原礼言：乃衡先君司萧山之日，先生来相访；其还越也，遣此。当是乙未夏也。然不可考。已后一帖，戊戌春所遣无疑。盖丙申春，达识铁木尔来为丞相江浙，时括属县六，寇居其五，故沿海檄万户石末宜孙以浙东副元帅领郡兵讨之。弗克。丞相到省，即起先生与先左司俱往，谕以文告之命而至括。以其夏寇虽降而复反侧，且二岁迄不能底定。戊戌春，乃纵军草薶之。其夏，青田寇吴成七，松阳寇宋龙九，遂昌寇潘贤三，缙云寇杜仲光悉伏诛，他若吴英七、周天觉等，争相率诣军门款服，而括遂平矣。今帖首言“奉别两载”，而中有“山寇渐就诛夷”之语，以此遣于其春也。是冬，上亲征婺。十一月，婺守将宁安庆举城降。寻移兵临括，先生去之青田山中。王师入括，则己亥十一月也。明年春，征先生与胡深、章溢、叶琛诣南京。越国胡公乃戒裨将缪美以先生四人入覲。上一见先生，语合意，留居帷幄，日见信任，与闻大计。乙巳夏，拜太史令。上登极，拜翰林学士，迁御史中丞，兼太子赞善大夫，复入宏文馆为学士。及论功行赏，封诚意伯。於戏！至正之末，郡县间盗贼军旅之事如彼，先生名进士，素负才略，而见用仅如此，欲无危亡，得乎？今天子识先生于肤敏之中，倚以为谋臣，而先生乃得效其奇谋秘计，以弼成鸿业，遂与开国元勋比烈焉。此与伊尹之用不用，而夏以亡商以兴，奚异哉？洪武甲子闰十月二十日，前史官眉山苏伯衡跋。（卷十四）

### 送任原礼东归序 苏伯衡

任氏之子原礼，始余识之高君则诚馆下，朴茂而谦和，望而知为雅士也。及见其所为诗文，思致渊永，又知其学之优焉。其所从游者，尽当世名公：若吏部尚书刘自牧、枢密判官迈公善卿最所推许，今御史中丞刘公、翰林王先生尤器爱之者也。时受业高君之门，无虑数百人，原礼周旋其间，兄事其长者，弟畜其幼者，衣食其匱乏者。同门之士，或持其所珍爱服用以去，亦不以属意。天台闻一民者，高君友也，一日暴死逆旅，故旧若罔闻知。高君以托原礼。原礼亟往殡，备道里费，资其仆以丧归。余每谒高君，退见原礼，未尝不相语移时，然窃意其待师友为然，不知其于大夫士皆然也。既时，吾父宰萧山，原礼盖县人也。萧山岸浙江，吴越道所出，冠盖东西行过县中不绝。而仕己者又多乐依吾父。原礼于是来者郊迎，去者致饯，留者授馆授餐，旦则具舟舆，与之泛湘湖，陟北岭，娱情山水间，暮则馆于其所谓萧然山堂，或琴或弈，或投壶，或论文赋诗，极欢乃罢，如是者虽累月逾时

不倦。乃知原礼之待大夫士皆然，不特于师友为然也。夫原礼布衣尔，非有兼人之资，其汲汲焉尊贤之为务，盖将亲薰而炙之，不贤而能之乎？其见器于诸公也，宜哉。

今年秋，原礼闻中丞公起自休致，王先生入朝为待制，不远千里来请益焉。余被员成均，邂逅益欢。自余别原礼，垂十五年。所见与之共学者，不必皆贤，率多矜才炫能，以就功名，取富贵，不旋踵而摧败，身与陷阱，剪为俘囚，其人往往。而吾原礼幸而相见，固无恙也。出其别后所为诗文，甚富且大进，以其所负计之，其于众人固孰得失乎？呜呼，君子病无闻矣，非假乎功名富贵也，假功名富贵而闻焉，则其闻焉者能几何哉？盖君子之为学，何也？将以行之而已。学之而行焉，其行义之修于家，其猷为之著于世也。而况又文词以自鸣，若吾原礼者，虽欲无闻，得乎？彼驰骛声利之场，吾不知其何也。二公方将论荐之，而原礼告归，于是率士友赋诗以赠之，而属余为序。洪武乙酉九月己亥眉山苏伯衡序（卷十四）

跋王子充先生撰任氏《萧然山堂记》后 苏伯衡

今年秋，原礼来南京，视中丞刘先生、待制王先生。而余备员成均，因获相见。计为别已十有五载。追数当时会合之人，尽矣，而独余三人者在，慨叹久之。语次及山堂，乃始知已毁于庚子之兵。而二先生记文亦不能独存。重有感焉。刘中丞稿莫之存，而王待制固存稿也。朝廷责成《元史》甚切，而王待制总裁，朝夕不遑暇，欲重书遣原礼，不果。山堂虽不存，而原礼兄弟奉亲读书则犹曩时，亦可喜已。余故为书之云。洪武乙酉九月既望，眉山苏伯衡记。（卷十四）

跋任氏交游文翰卷后 顾硕

硕在至正戊子、己丑、庚寅之岁，师伯舅琼台陶先生，读书钱塘。时永嘉高先生则诚以处州录事辟掾江浙行省，括苍刘先生伯温副提举江浙儒学，皆与伯舅为至交。金华王先生子充自京师黄学士先生讲下卒業而还，与伯舅有莫逆之契。论文每至夜分，屡数日而别。庚寅之冬，伯舅赴广信永丰文学任，而高、刘二先生亦皆秩满散去。逮我圣朝革元命，刘先生仗剑西归，侍皇上亲征，参谋军事，功在元勋之列。伯舅于洪武乙酉被召，预修元史。时王先生由漳州府通判擢翰林待制，偕侍讲学士潜溪宋先生为总裁。史成，伯舅除任应奉翰林文字，苟起礼部尚书。刘先生历御史中丞，宏文馆学士，封诚意伯，致仕家居；亦时往还京师。眉山苏先生平仲由国子学正升翰林国史院编修官，硕亦以非材忝任吏部主事。王先生以修顺帝史稽迟，左迁翰林编修。硕居铨选，得与王先生考验教官，时相与处。及王先生使云南，硕亦出令平阳之石楼。伯舅拜参政湖广行省，皆不复聚首矣。永乐庚寅，硕以衰暮之年，偶来萧山。会任君元庸所藏刘先生《怡怡山堂记》，苏

先生所撰先长者所墓志，王先生《萧然山堂记》，高、刘二先生寄伯大、原礼父子各二帖，王先生寄郎中君拱一帖，皆致意于伯大父子昆弟者也。君拱姓余氏，永丰人，伯舅弟子，为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卷后有国子助教张孔升先生所撰《先耆士伯大墓铭》、《任氏家谱图序》、《时思庵记》，则近岁所作。王先生之令子国学博士绅有通原礼一书，叙世好也。硕伏读之次，慨念诸先生皆尝亲炙而不可复见，其于渭阳之感，有不能自己者。任氏诗书之泽，久而弗替，所以光昭前烈者，不在彼而在此，真知务哉！呜呼，前辈之嘉言善行，孝子顺孙之所以善继善述，与夫朋友交游之义，尽在于此。观是卷而其额不泚然知愧者，岂人贤子孙哉？王先生以死事谥文节。伯舅讳凯，字中立，学者称琼台先生，终晋府右相，卒于官。元庸则原礼之季弟，以文行世，其家因并及之。永乐八年春正月既望乐安晚生顾硕谨识。（卷十四）

刘基留给任氏的诗文显然不止7篇，尤其是在元末，刘基曾长期与任氏交往，不可能只有三篇诗文。这一点从刘基的《任君燕居记》中也可以看出，《记》中称：“尝赠《怡怡堂记》矣，尝赋萧然任氏篇什矣，翰墨载诸彤管，固不一而足。至是复以燕居请予，予不辞而记之。”显然，还有多篇刘基的诗文未能保存下来。刘基和高明等给任氏的信札，苏伯衡和顾硕等见过，甚至明末清初的毛奇龄也曾看过，并撰有《任氏家藏刘诚意札记卷子书后》，但嘉庆本《任氏家乘》及其他文献中都不见收录，大概到嘉庆时已经散佚。

### 三

《任氏家乘》中刘基等人的佚诗佚文虽不见于流行的诗文集，且存在少量的疑误，但总体上看，是真实可信的。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可以先看看高明等人的佚诗佚文。

（一）高明的《陪青田诸公宴萧然山堂》。《任氏家乘》中的《陪青田诸公宴萧然山堂》共有三首，作者除高明外，还有陆景龙和冯恕，同题同韵，应该是唱和之作。如陆景龙的诗云：“萧然山下任征士，流水柴门护白云。霜树青红秋色净，烟峦紫翠暮光分。乘舟仙子芙蓉佩，列坐嘉宾锦绣文。可惜苏郎不同醉，令人怅望夕阳醺。”<sup>①</sup>这三首诗暂未见到其他文献收录，其真实性似值得怀疑。但在王祹的《王忠文集》中有一首题名为《偕游任氏萧然山堂和高则诚壁间韵》的七律，诗云：“暑雨凉风七月尽，萧然山上看飞云。海水江水咫尺合，吴山越山图画分。干戈满目正崇武，笔砚随身谁卖文。幸得风流二三子，清吟剧饮到斜曛。”<sup>②</sup>这首诗虽然题名不同，《任氏家乘》中也未见收录，但内容、韵脚与高明等人的《陪青田诸公宴萧然山堂》完全一致。显然，王祹所和的“高则诚壁间

<sup>①</sup>陆景龙：《陪青田诸公宴萧然山堂》，《萧山任氏家乘》卷十六。

<sup>②</sup>王祹：《王忠文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韵”原诗就是高明的《陪青田诸公宴萧然山堂》一诗，《陪青田诸公宴萧然山堂》一诗为高明的佚诗无疑。

(二)顾硕的《跋任氏交游文翰卷后》。任氏族人曾把任原礼与刘基、王祜等人的交游文章装订成册,供后人瞻仰,也随时邀请后来的名人撰文题跋。顾硕的《跋任氏交游文翰卷后》(以下简称顾《跋》)和苏伯衡的《跋刘伯温先生手帖后》(以下简称苏《跋》)都属于这种题跋。顾硕字景蕃,仙居人,洪武中以通经儒士累官吏部主事,又曾任平阳石楼令,《千顷堂书目》卷十七著录其《石楼文稿》。顾硕在《跋任氏交游文翰卷后》中称,自己于“至正戊子、己丑、庚寅之岁,师伯舅琼台陶先生,读书钱塘”,当时的高则诚、刘基“皆与伯舅为至交”,“论文每至夜分,屡数日而别”。这里的“琼台陶先生”即陶凯,字中立,临海人,曾领至正乡荐;入明后,曾与宋濂等同修《元史》,历任礼部尚书、湖广参政、国子祭酒、晋王府右相等职。

刘基的《刘显仁墓志铭》中有“至正八年,予初寓杭州,交友未尽识也。求士于天台陶中立,得四明刘显仁焉”<sup>①</sup>等语,至正八年即戊子年,与顾《跋》的时间吻合。刘基的《孝友堂记》又称“(陶)凯无他兄弟,唯一妹,适顾氏,早卒。凯为育其子及女以成人,如己子”<sup>②</sup>。这与顾《跋》的“师伯舅琼台陶先生”之说一致,顾硕应该就是陶凯妹妹的儿子。刘基的《寄陶中立郭秉心叙旧言怀》又有“论文握手到尔汝,知有胶漆无参商”<sup>③</sup>之句,与顾《跋》的“论文每至夜分”之说一致。显然,顾硕的《跋任氏交游文翰卷后》是完全可信的。

(三)苏伯衡的《送任原礼东归序》等。苏伯衡,字平仲,金华人,苏辙后裔,曾任国子学录、学正、翰林编修等职,与宋濂、刘基、王祜等交往密切,有《苏平仲文集》传世。关于苏伯衡与刘基的关系,可以列举几条:1. 至正十六年到十八年(或说十九年),刘基曾与苏伯衡的父亲苏友龙在处州共同协助石抹宜孙平定当地的农民起义,石抹宜孙以“刘基为其院经历,萧山县尹苏友龙为照磨”<sup>④</sup>,由于父亲的关系,苏伯衡在这一段时间应该与刘基有过较多的直接接触。2. 至正二十三年,朱元璋置礼贤馆,苏伯衡与刘基、章溢、宋濂等同入礼贤馆。3. 入明后,苏伯衡与刘基同朝为官,苏伯衡曾为国子学正、翰林编修,刘基任御史中丞。4. 洪武四年,刘基曾为苏伯衡的文集作《苏平仲文集序》,此序既见于《刘基集》,也收入《苏平仲文集》。

《送任原礼东归序》和《跋王子充先生撰任氏〈萧然山堂记〉后》写于洪武二年(1369)九月,当时,任原礼到南京拜访刘基、王祜等。这两篇文章对任

①(明)刘基:《刘基集》,第182页。

②(明)刘基:《刘基集》,第111页。

③(明)刘基:《刘基集》,第292页。

④(明)宋濂等:《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第4310页。

原礼的赞美等内容也许可以伪托,但其中的“今年秋,原礼闻中丞公(刘基)起自休致,王先生入朝为待制,不远千里来请益焉。余被员成均,邂逅益欢。自余别原礼,垂十五年”,“朝廷责成《元史》甚切,而王待制总裁,朝夕不遑暇”等史实,则不是一般人能了解的。刘基于洪武元年六月因妻丧回家,乡居故里,年底方被朱元璋诏还起用,仍为御史中丞,故有“起自休致”之说。王祜于洪武元年十二月,由漳州诏回南京参修《元史》,次年二月任总裁官,六月拜翰林待制,这与“入朝为待制”,“朝廷责成《元史》甚切,而王待制总裁”等完全吻合。

有关苏伯衡自己的描述更为精确。刘基于至正十六年(1356)三月回处州协助石抹宜孙平“寇”,时任萧山县尹的苏友龙也应该在此前后离开萧山,在石抹宜孙手下“为照磨”,苏伯衡当在此时随父亲苏友龙离开萧山。到洪武二年秋天在南京再次相见,与“垂十五年”完全吻合。另外,关于苏伯衡的任职,宋濂的《苏平仲文集序》中有“仕皇朝,由国子学录为学正,上亲擢国史院编修官”之语;刘基的《苏平仲文集序》中也有“即升学正,上亲擢翰林国史院编修官”之语,并署明该序写于“洪武四年春正月十日”<sup>①</sup>。可见,苏伯衡入明之初为国子学正,至迟在洪武三年已经任翰林编修。《送任原礼东归序》在洪武二年秋季(即“今年秋”)这个时间点上,尚称“备员成均”(即任职国子监),显然对苏伯衡的任职情况掌握得非常精准,这如果不是事发当时,不是当事人自己,很难做到这样的准确。因此,《送任原礼东归序》和《跋王子充先生撰任氏〈萧然山堂记〉后》两篇文章虽未为《苏平仲文集》收录,但它们为苏伯衡所作无疑。

《跋刘伯温先生手帖后》也未收入《苏平仲文集》,但其真实性同样是不容怀疑的。《跋刘伯温先生手帖后》对苏友龙任职萧山和处州的描述,对刘基仕明前和入明后基本经历的回顾,对朱元璋军平定处州过程的概述等,都非常准确;其作者应该与苏友龙、与刘基存在密切的关系,且对当时的大局非常了解。另外,苏《跋》中有关处州平“寇”的描述与刘基等的相关诗文也完全吻合:刘基自绍兴回到处州后,即作《谕瓯括父老文》,稍后,又在《处州分元帅府同知副都元帅石末公德政碑颂》中称“今予以行省檄,与公同议招辑事”<sup>②</sup>;这与苏《跋》中的“丞相到省,即起先生与先左司俱往,谕以文告之命而至括”吻合。《处州分元帅府同知副都元帅石末公德政碑颂》中又有“(至正十六年)夏五月,豪酋既来纳款”,“七县豪酋,相继纳款”<sup>③</sup>等语;但这些“豪酋”并未真正降服,随后又相继叛乱,直到至正十八年夏秋之际才基本平定,如宋濂为胡

<sup>①</sup>宋濂和刘基的《苏平仲文集序》既分别收于宋濂和刘基的文集中,也一同收于苏伯衡的《苏平仲文集》,文字略有差异。本处引文均出自《苏平仲文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sup>②</sup>(明)刘基:《刘基集》,第193页。

<sup>③</sup>(明)刘基:《刘基集》,第191、193页。

深写的《胡公神道碑铭》、为章溢写的《章公神道碑铭》等文献中都提及该事。这些记载与苏《跋》中的“以其夏寇虽降而复反侧，且二岁迄不能底定”等内容吻合。这表明，《跋刘伯温先生手帖后》确是苏伯衡所作。

高明、苏伯衡和顾硕等人的轶诗轶文确证后，刘基诗文的真实性也就容易判断了。为方便起见，我们同样分三点加以说明：

（一）《任君燕居记》。《任君燕居记》的行文风格与刘基惯用的风格完全一致。另外，《任君燕居记》开篇即称：“至正之秋，八月既望，余时馆于萧山任隐君伯大家。”这里的“至正之秋”应该指至正十五年秋。因为，刘基十四年春方避乱于绍兴，十六春即离开了绍兴，只有至正十四年或十五年符合“至正之秋”之说；《任君燕居记》中又有“尝赠《怡怡堂记》矣，尝赋萧然任氏篇什矣，翰墨载诸彤管，固不一而足”之语，说明这篇文章写得较晚，因此该文应该写于至正十五年。苏伯衡的《跋刘伯温先生手帖后》又交待，至正“乙未夏”，苏友龙任萧山县尹时，刘基曾来拜访过苏友龙，回绍兴后还给任氏写过信。显然，刘基这一段时间确实来过萧山，在此期间为任氏写《任君燕居记》是完全可能的。

（二）《长江风雨图送任原礼归萧山》、《送任原礼东归》和《送养晦先生东归》。从诗歌内容看，这三首诗都写于南京，写于洪武二年秋天。苏伯衡的《送任原礼东归序》已经交待，当时的任原礼专程到南京拜访刘基、王祚，“二公方将论荐之，而原礼告归，于是率士友赋诗以赠之，而属余为序”。从《任氏家乘》收录的情况看，当时在南京的宋濂、王祚、揭傒、张孟兼、李克正等都有诗相送。刘基作为主人，更应该有诗歌相送，因此，《长江风雨图送任原礼归萧山》、《送任原礼东归》、《送养晦先生东归》三首诗也是完全可信的。

（三）《任氏世系图叙》。《任氏世系图叙》的真实性最容易受到怀疑，其问题有如下几个方面：1. 所署时间为“洪武甲寅元夕”，即洪武七年正月，当时的刘基被迫留京，且年老多病，此时为任氏作序似乎不太可能。2. 落款为“御史中丞兼太子赞善”，当时的刘基已经不再担任御史中丞之职，按照常识，落款应该称“前御史中丞”。3. 文中称：“在座有浦江宋公、永嘉高公、金华王公、丽水叶公、太平李公、乐平许公，皆当时硕彦……承隐君解衣推食七载，绝无怠色。”这里的“宋公”、“高公”、“王公”等不可能同时来到任氏家，“解衣推食七载”之说也不太可信。

不过，如果我们结合刘基当时的处境和心情考察，《任氏世系图叙》的内容仍然是可信的。我们先说说上面提到的疑点：第一，刘基留京不归期间，虽年老多病，但仍时有应酬，如在洪武七年正月，曾作《（缙云）赵氏宗谱序》<sup>①</sup>，本年春，又曾为宋濂之子作《送宋仲珩还金华序（并诗）》，因此，刘基为任氏作《任氏世系图叙》是完全可能的。第二，落款的“御史中丞”之误，应该是任氏

<sup>①</sup>参见周松芳《自负一代文宗——刘基研究》，第294页。



后人的传抄之误,而且,很可能是有意为之,因为现任御史中丞比“前御史中丞”有分量得多。第三,“宋公”、“高公”、“王公”等虽未曾同时来到任氏家,但他们都来过任氏家,这是事实。刘基在多年后的回顾中,也为了表达对任氏的赞美,这样笼统地交待是完全可能的。另外,顾《跋》中有“先生之于元(原)礼也,自为提学时交游矣”之语,刘基卸任儒学副提举之职在至正十一年三月底四月初<sup>①</sup>,刘基与任原礼的交游极可能在至正十一年之前(也许就在至正十年),到至正十六年回处州,刚好7年,因此,“解衣推食七载”之说并无不当。

再看《任氏世系图叙》的其他内容:(1)《任氏世系图叙》在回顾刘基入明前的经历时,绝口不提其参与铁里帖木尔军事以平方国珍之乱,参与石末宜孙军事平定处州之乱等活动,而以“后值盗贼蜂起,群雄窃据,海内分崩,民不安处,予与诸公后先辞归。己亥,胡将军下括苍,谬膺荐剡。今上招参帷幄,预赞军机”等语一笔带过,完全符合刘基当时被迫去职、又被迫回到南京困守的处境和心态。(2)《任氏世系图叙》又称“洪武甲寅,予告告解组,逍遥泉石”,又说“抱病率叙”,这与刘基当时的经历和身体状况等吻合。(3)《任氏世系图叙》中的“承隐君之孙,伯大、叔大之子,曰道曰瑄,惠顾敝庐”之语,存在明显的错误。其中的“隐君”指任荣,“伯大”和“叔大”都是任荣的儿子,“道”是伯大的儿子;而“瑄”则既不是“伯大、叔大之子”,也不是“隐君之孙”,而是“隐君”任荣兄弟的孙子,“伯大、叔大”堂兄弟的儿子。任氏家族当时刚刚编好《任氏世系图》,故派任道、任瑄两人专程到南京请刘基作序。这种明显的错误表明,《任氏世系图叙》不是任氏自己伪造的,应该是刘基所作。

概而言之,《任氏家乘》中署名刘基等人的诗文虽多未为其他相关文集所收录,但都真实可信。杨讷在《刘基事迹考述》中认为,刘基的真实经历一直未得到准确的认识,因为,“署名黄伯生撰写的《故诚意伯刘公行状》杜撰了许多刘基故事,掩盖了刘基的一些真实事迹”<sup>②</sup>。杨讷并未见过《任氏家乘》中的相关诗文,但这些诗文却从多个方面印证了《刘基事迹考述》的观点。显然,《任氏家乘》中的相关诗文不仅可增补刘基的诗文,还可以丰富刘基生平经历的具体史实,对刘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理工大学中文系

<sup>①</sup>学界一般认为,刘基辞去儒学副提举的时间在至正十一年秋冬,笔者认为应当在当年三月底四月初,有另文考证。

<sup>②</sup>杨讷:《刘基事迹考述》之《作者前言》,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1页。